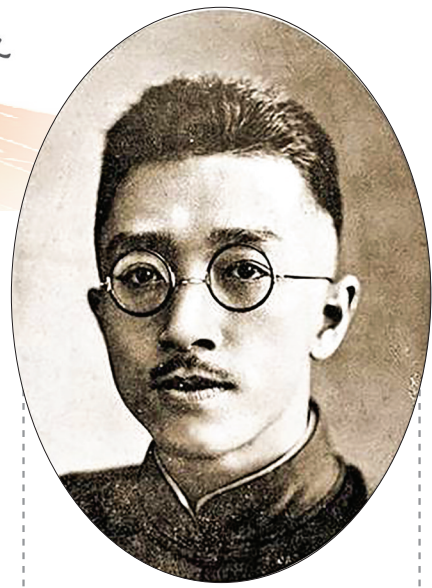


薛笃弼先生趣闻(下)

 河东记忆


薛笃弼先生(1892年~1973年)，字子良，山西运城盐湖区车盘村人。1911年11月，还在山西法政学校读书的薛笃弼即投身辛亥革命。他曾出任山西省革命机关报《并州日报》编辑，继之，任河东军政分府《河东日报》社长、《山西法政经济日报》总编。

1913年薛笃弼游历日本时，有幸当面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。1914年，他随冯玉祥转战南北，与河北鹿钟麟并称为冯将军的“左右手”，名赫一时。

中华民国时期，薛笃弼先后任常德、咸阳、长安县县长；北洋政府国务院代秘书长、司法部次长、内务部次长、京兆尹；陕西省、河南省财政厅厅长；甘肃省省长、河南省代省长等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直置身于祖国统一大业的他先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上海法学会理事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。

张博文

北京建园

1924年9月，薛笃弼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。12月，32岁的薛笃弼调任京兆尹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北京市市长。他少年时在家乡受关公忠义精神及家规家训的熏陶，崇尚义举；青年时曾经当面聆听过孙中山先生教诲，体谅民困，施政为民。在京兆尹任内，薛笃弼放手发动百姓检举各县的贪官污吏和劣绅，裁劣举贤，并取消了许多苛捐杂税，以解民困。

当时，北京的钟鼓楼管理不善，年久失修。薛笃弼带头捐款，并赴各地募集资金，将鼓楼辟为“京兆通俗教育馆”，开创了北京历史上民众教育的先河。为了使民众牢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国耻，薛笃弼按照“明耻教战”的古训，将鼓楼改为“明耻楼”，楼上陈列了清廷屈服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相关资料和图片，展出了国耻照片和实物，被八国联军刺破的一面大鼓也陈列在鼓楼内，以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，警示后人。此举深受各界人士推崇。

接着，薛笃弼再次捐资为民众将地坛开辟为京兆公园。

地坛，位于安定门外。清朝灭亡后，地坛祭地的仪式被废止，地坛也逐渐荒废。北洋政府统治期间，地坛成了军阀驻军的场所，地坛内的古建和古树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。袁世凯的军队曾经在地坛墙上凿洞以搭建营房，大片的古树甚至被驻军砍伐以充当柴火。

1925年3月，薛笃弼呈文内务部，提出“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为北郊公园，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务

之所”的议案，很快获准执行。在薛笃弼的带动下，一些机关纷纷捐款。有了资金，旧坛改造工程便迅速展开，短短3个月，便完成了一系列工程：平整马路、建设公共体育场、修筑“世界园”、建“共和亭”、成立“通俗图书馆”、装设电灯、粉刷墙壁等。经过改造，地坛的内坛区域修葺一新，外坛部分仍然归农事试验场使用，在一切准备妥当后，1925年8月2日，京兆公园正式对外开放。

当时，公园里最著名的当属“世界园”，这座园中园“画地为图，以石代山，以草代木，以花木辨其国土，以旗帜志其国名。所有世界上名山、大川、都会、商埠、铁路、航线、岛屿、海湾，无不点缀具备。而中国之地势，如各省、省会、五岳、五湖、长城及长江、黄河、珠江三大河流，亦莫不分别清晰”。

“世界园”还特意标明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沦丧的国土及被洋人租借的口岸，体现了公园“极力提倡国家至上理念，唤起群众爱国思想”的宗旨。

这个京兆公园，是北京城外供老百姓休闲娱乐开放的第一座公园。

遗贤不闲

1948年，在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后，薛笃弼辞去国民党南京政府水利部部长职务，寓居上海，居住于思南路61号花园洋房，闭门不出，不再参与政治活动。

1949年年初，李宗仁专程来到上海看望薛笃弼，邀请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，被薛笃弼以厌倦政务为由婉辞。上海解放前夕，陈诚上门要求其全家去台湾，也被薛笃弼以奉养老体弱的双亲为由婉拒。这时的薛笃弼，远离尘嚣，期望能颐养天年。

1949年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。毛泽东主席发现政协委员中不见薛笃弼的名字，不由发出“野有遗贤”的慨叹。后来，薛笃弼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1956年，全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后的聚餐时，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同席，同席的还有周恩来总理、张治中将军、卫立煌将军和著名中医施今墨等。稍作寒暄后，薛笃弼谈到在国民党政府历任的职务，并说“我对人民有罪”，言下不胜愧疚。毛泽东主席对他勉励有加，亲切地对他说：“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，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，真是野有遗贤啊！”薛笃弼当时很感动。会毕回家，他还兴奋不已地转告妻子和女儿们，并连声说：“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知遇之恩，今后我为国事竭尽绵薄。”

晚年的薛笃弼常说，他前半生在国民党政权，后半生在共产党新中国，看到新中国新气象，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希望国家日益富强。

薛笃弼还在家中挂上条幅，表明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，并以此教育后辈。从此之后，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，每会必到，到会必言，坦陈己见。

他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各项活动，无论是接受新闻拍摄，还是电台录音，他都认真准备，一丝不苟。他经常写文章，通过对台广播寄语客居台湾的故旧，介绍祖国大陆建设成就，宣传“爱国一家、爱国不分先后”的方针。

1962年，薛笃弼去北京开会，突发心梗，当即被送到阜外医院抢救，方得转危为安。他说：“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晚年，他还历任上海法学会理事、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、上海市政协常委、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、民革中央委员等职。为祖国统一，他殚精竭虑，不遗余力，可谓“遗贤不闲”。

苑咀华

张克嶷《送友人之广文任》中的清廉

王凤

送友人之广文任

清·张克嶷

少年开口话伊周，壮志空存老未酬。
吾道尊非因及第，人师贵岂待封侯。
于今绛帐稀黄发，自古青毡重白头。
边地莫嫌官署冷，饱餐苜蓿又何求。

这首诗的作者张克嶷(1646年~1721年)，字伟公，号拗斋，闻喜人，康熙十八年(1679年)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改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，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四称他“执法坚决，无所畏避”。

题目中的“之”，意为“往，到……去”。广文，唐天宝九年设广文馆，设博士、助教等职，主持国学，当时被看成清苦闲散的教职。明清时称儒学教官为“广文”。本诗应是作者张克嶷写给即将成为儒学教官的友人的一首赠别诗。

首联中，“伊周”是指商代的伊尹和西周的周公旦。伊尹，名挚，尹为官名，商朝开国元勋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。伊尹主持建造偃师商城，规范使用甲骨文，政治上主张“明德则天下存，失德则天下亡”，对商的创立及巩固起了

重大作用。周公，姬姓名旦，西周开国元勋，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“元圣”、儒学先驱，周文王姬昌第四子，周武王姬发的弟弟，因采邑在周，故称周公。武王薨逝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。周公制礼作乐，主张“明德慎罚”，以“礼”治国，奠定了“成康之治”的基础。伊尹和周公旦两人都曾摄政，历史上常将他们并称。“伊周”也代指那些历史上德行和政绩彪炳史册的辅政大臣。“酬”，意为实现。

颔联中，“吾道、人师”，皆指师道，即为师之道，为人师者，指以儒学教官为代表的师者，师道。“尊”，指尊贵。“贵”，意为重要。“因”，意为依靠、凭借。“及第”，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。“岂”，表示反问，怎么。“让”，表示退让。“封侯”，指封拜侯爵。

颈联中，“绛帐”引用了“绛帐授徒”的典故，典出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，“绛帐”即“红色帐帷”。东汉儒家学者经学家马融学识高深渊博，常在高堂上设置红色帐帷，同时在后方设置女乐，以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。后“绛帐授徒”指师长设立讲座，传授生徒，多含有尊崇称美之意。“稀”，即少、稀少。“黄

发、白头”，皆代指老人。“青毡”，古诗词中常用“青毡”典故来赞美儒者世家。如北宋晁端礼《雨中花》“独步文章、家传素业，世宝青毡”中，“世宝青毡”意思是谨守儒者世家的美德；南宋王千秋《沁园春·晁共道侍郎生日》“有青毡事业，丹凤才华”中，“青毡事业”指晁家世代以攻读诗书辅国安民为事业。“重”，即重视、尊重。

尾联中，“官署冷”，此处用典。杜甫《醉时歌(赠广文馆博士郑虔)》诗中前四句“诸公衮衮登台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。甲第纷纷厌粱肉，广文先生饭不足”，意思是无事的人个个身居高位，广文先生的官职却很清冷。豪门之家吃厌了米和肉，广文先生的饭食反而不足。杜甫借此诗为广文先生郑虔鸣不平，他道德被举世推崇，仕途却总是坎坷；薛采虽能流芳百世，却解决不了生前的饥寒。诗歌用这个典故来表达儒学教官生活的清苦。

这首诗的大意是：年少时胸怀鸿鹄之志，开口即谈伊尹和周公，希望像他们一样匡时济世，治世为民，施展抱负，建功立业，结果却空有一腔报国之心，已至人生暮年依然没有实现。师道受

人尊崇并不是凭借科举高中，师者地位尊贵哪里比不上封拜侯爵。现在绛帐授徒的师者中“黄发”老者是很少的，但自古以来，儒者世家中的老者都是最受人尊重的。到偏远的地方任职，不要嫌弃官署清冷、生活清苦，哪怕是以苜蓿饱腹又有何妨，还有何所求呢？

廉心语：

此诗歌是一首送别诗。作者安慰友人虽然壮志未酬，但身为广文先生，成为一名儒学教师，依然有着令人尊崇的地位，并不比封拜侯爵差，鼓励友人克服工作环境的清苦，安心教育，有所作为。

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今天的我们要端正态度，坚持吃苦在前、享乐在后的价值取向，在急难险重的岗位上锻炼自己，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磨炼自己，在忆苦思甜中汲取前进动力，不断涵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。

